

“国漫崛起”不能只满足于展现技术的进步

郑炀

观点提要

“国漫”要在新的产业环境下传达蕴藏于影像背后的“精气神”，就更须观照从创意阶段生成的中华文化内生力。倘若今后的创作仍然只限于复述或改写经典文本，缺少依靠文化内生力转化的创作“原力”，那么市场审美疲劳结局或许是可以预见的，而“国漫”推进动画技术进步的意义也将大于文化意义。

《新神榜：杨戬》上映之后，追光动画与彩条屋影业两个国漫大电影的“头部牌”在“封神”题材影片出品数量上战成了“二比二”平手，共享相同文化内核却又风格迥异的两种“封神宇宙”已初具规模。前者“新神榜”系列以“朋克”元素与奇诡的想象力著称，后者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则更专注于对经典文本进行现代重塑。这种相似“电影宇宙”的分庭抗礼格局，不禁令人联想到好莱坞两个势均力敌且长期受到全球市场关注的“超级英雄宇宙”。

“国漫”中的“文化力学”

的确，以“封神”题材为代表的“国漫”影片中光怪陆离、璀璨夺目的视觉效果，与迪士尼、梦工厂作品相比亦不逊色。然而电影不仅仅是工业消费品，同时也是文化艺术的载体。因此，要判断“封神宇宙”电影阵列与国漫电影产业工业化体系之间是否已形成正向关系，应当首先脱离产业和市场因素，从创作本身是否源自“文化内生力”来判断。因为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目的和

结果指向文化传播与输出，而其效果则是验证这一体系的关键性指标，“文化内生力”又恰是实现文化传播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依据。

相比美国的“漫威宇宙”“DC宇宙”等知名“漫改”电影IP，国产的“封神宇宙”电影显然更重视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和素材，而回顾“追光”与“彩条屋”出品的大多数影片，也确然常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传统文脉相联：除了化用《西游记》《白蛇传》故事的《大圣归来》《白蛇：缘起》之外，还有移植其人物与情节进行再创作的《白蛇2：青蛇劫起》，以及氤氲着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大护法》《小门神》《小夜游》等原创故事影片。虽然不少影片在融合经典文本与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做到表及里，但仍有许多作品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仅仅是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单拼贴与挪用，不断地营造“他者”视阈中的奇观，有些作品主旨内核与影像呈现时常发生背离。例如，通过《姜子牙》对“下克上”的讴歌，《大鱼海棠》对“轮回说”的改写，《青蛇劫起》对破注若凡本“叙事”的借鉴等，就得以看出“国漫”作品矩阵的表达方式并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实际上说明了许多“国漫”作品的创作动因并非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生力”，而是对《大圣归来》成功借用传统文化与经典文本来自示“国漫崛起”的市场经验的一再模仿与摸索。换言之，“国漫”创作的商业动机明显前置于文化动因，较之作品“封

神”更重要的是票房“封神”。毕竟七年前在“自来水”支撑下《大圣归来》所创造的票房奇迹对任何片商而言均极具诱惑力。那么，因《大圣归来》成为“爆款”而进入人们视线的“国漫”后续作品，就必然意图复制这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欧美动画平分秋色的成功营销捷径——率先开启“封神宇宙”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实际上就再次做到了。

在文化层面，除了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强调的自觉之外，“国漫”也是面对外国动漫作品输入压力的应对之策。面对“欧风美剧”和“日韩韩流”所占据的全球动漫文化制高点，中国动画电影应当选择何种方式来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以此来与对手遥遥角逐，这一严峻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的“反向输入”，不仅刺激了中国动画人的民族自尊心，还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达方式的创作范式。此种环境下，“国漫”的影像表达不可避免会出现“文化杂糅”——《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人物造型明显参照了迪士尼作品的视觉形象，《新神榜：杨戬》中的杨戬则反复地吹响爵士风格的口琴乐——在这一文化力学的结构下，外力与内生力之间相互交错。结果，“国漫”电影在这种市场导向与内外双重重文化驱动的对接之下接连生产，而作品表达方式的不稳定恰是这一结构所导致的。

类型与题材重复的“自我反噬”

然而笔者并无意批判商业性“原罪”，而是意图强调：以营销思维为导向的创作模式的终极状态，不仅可能遮蔽与掩盖潜伏于影像呈现之下的文化内涵，甚至最终反噬自身的存在。尤其是当借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传统文化来创作故事成为无可置疑的“必选动作”，那么“国漫”影片则容易陷入类型与内容局限难以形成有生命力

且可持续的多元创作生态。

以史为鉴——如今的“国漫”电影创作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武侠神怪片”浪潮在市场环境、题材选择以及技术手段上具有较强的同构性，同样鲜明地体现了市场选择与文化自觉性之间的纠缠关系。彼时，中国电影在“欧化”与“尚古”两种审美风格角逐之后，“尚古”成为了市场的最终选择，并以此开辟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初的商业竞争时代。虽说如今史家常以“粗制滥造”诟病之，但“武侠神怪片”浪潮的积极意义在于迈出了中国电影选择民族风格发展道路的关键一步。在题材上，“武侠神怪片”常以武侠、志怪、言情小说为改编蓝本，并且在制作过程中率先广泛使用动画手段来实现种种超凡的视觉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可以被认作是“电影宇宙”雏形的系列片，如明星公司的《火烧红莲寺》前后制作了19部之多。但是，如此蔚为可观、声势浩大的“武侠神怪片”浪潮最终因陷入类型和题材重复雷同、脱离现实生活而宣告终结。

反观如今的“国漫”，绝大多数影片均是传统神话题材，“封神宇宙”电影等头部作品自不待言，就连许多缺少票房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中小成本动画电影也常带有神话色彩，而像《雄狮少年》《大世界》等现实主义动画不仅创作总量少且明显缺少关注度。虽说目前“国漫”之规模尚不及“武侠神怪片”浪潮，但倘若“国漫”今后的创作仍然只限于复述或改写经典文本，缺少依靠文化内生力转化的创作“原力”，那么市场审美疲劳结局或许是可以预见的，而“国漫”推进动画技术进步的意义也将大于文化意义。

当今，人们似乎越是惊叹于《新神榜：杨戬》等“国漫”影片在视效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就越是想要穿透瑰丽的影像表层探索和解码其深层的文化用意。可是当这一探索越是深入，半个多世纪之前动画电影“中国学派”曾经缔造的历史丰碑就越是清晰。以上海美影厂作品为代表的融合传统国画、绘画、皮影、窗花、剪纸、民乐艺术



“国漫”大片《新神榜：杨戬》海报

的动画，既展现了精湛高超的制作技艺，又焕发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光芒与生命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渔光曲》《三个和尚》等影片成为超越时代与国界的经典力作，李可染、韩羽、张光宇、张正宇等著名画家都曾直接参与动画造型设计。那时，中国动画恰处于一个得以排除市场因素干扰、沉浸于追求艺术创新与表达的纯净年代，传统、历史与现实在其中融为一炉，而当今“国漫”若要在新的产业环境下

呼唤已被尘封半世纪之久的动画电影“中国学派”基因，还应学习前辈那般对中华文化更加虔敬。《新神榜：杨戬》的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掷地有声：“国漫”之魂在于中国精气神。那么，要传达蕴藏于影像背后的“精气神”，就更须观照从创意阶段生成的中华文化内生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在“法理”与“情理”中寻求律政剧叙事突围

——兼评电视剧《玫瑰之战》

艾志杰

由孙皓执导的律政剧《玫瑰之战》，自开播之后收视率连续破1，酷云EYE峰值一度达到1.6，但收官之时各平台分数平平。在题材、剧情、演员都有优势的情况下，《玫瑰之战》为何高开低走？律政剧如何实现叙事突围？如何融合“法理”与“情理”，“真实性”与“叙事性”，“感情线”与“律政线”？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人物的设计需促成“法理”与“情理”的调和

因遭遇家庭变故重返律所执业的顾念（袁泉饰）以其特有的“共情力”，在案件的理性审理之中展现温暖人情，既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又彰显法律的人文情怀，促成“法理”与“情理”的调和。如“顾念强奸案”中，顾念坚信顾念不会杀害保安，尽管前有顾念母亲晓薇的“塑料姐妹情”背叛，后有顾念父亲老顾的落井下石，顾念仍然选择相信从小看着长大的顾念，为其无罪辩护，尽显“法中有情”。“冯远辉上诉案”中，虽然顾念对杀害14岁少女的冯远辉恨之入骨，但她依旧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他辩护，鼓励他戴罪立功，并且安排他和母亲相见，彰显“情中有法”。有意思的是，顾念的“共情力”还进一步促成了“情理”向“法理”的转化。“醉酒案”中，全取太太郑瑾为了保障女儿的优质生活，甘愿替出轨的丈夫赵永霖顶罪，无视法律和法律的公正严明。有着同样遭遇的顾念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鼓励郑瑾勇敢面对新生活，并以女儿赵梓萱的纪录片之以情，郑瑾最终说出实情，赵永霖被绳之以法。

与具备“共情力”的顾念不同，《玫瑰之战》中的女强人形象令仪（俞飞鸿饰），则以“正义感”呈现着如何处理“法理”和“情理”的关系。“网红学术达人狼

袭案”中，她无视与狼袭者何子枫的私人关系，拒绝何子枫之妻宝霞的无理要求，维护白巧巧的个人权利。“枫江医药集团案”中，她不顾宋嘉辰的抢单威胁，对顾念去留问题坚决不让步，保证顾念公平竞争的权利。“汪小祥餐厅品牌案”中，作为汪若凡的律师，她识破汪若凡和令仪非律师的金钱交易，毅然“策反”，确保周令仪的原创菜品不被侵犯。她始终坚守着“正义感”，让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理”退场，维护“法理”的秩序与正义。

相较于顾念和令仪，剧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则在“法理”和“情理”中显得矛盾、游移。唐小樱背叛友情盗用叶勤勤的身份，无视法律顶替叶勤勤的大学名额。郑瑾为了“家庭体系”的稳定而违背“司法体系”的公正，差点让赵永霖逍遥法外。苏雯慧为了获得财产继承权，想要放弃爱她的钟友唯，剥夺其生存权。许倩妮为了在“电脑电路爆炸案”中占据上风，不顾陈烟等受害者的集体诉求。顾念婆婆郭美瑜明知顾念和宋嘉辰已协议离婚，仍然怂恿宋嘉辰夺回抚养权……这些女性形象在“法理”和“情理”之间徘徊、迷失，观众对她们褒贬不一，同时也给我们提供重新审视女性困境以及法律本质的路径。

的确，关注、审视女性形象是《玫瑰之战》的亮点。通过塑造顾念、令仪等女性角色，该剧不仅描写律政剧的女性形象图谱，而且借此阐明当代司法体系“法理”与“情理”的辩证关系。然而，相较于同类型经典美剧《傲骨贤妻》，该剧在勾勒女性内在成长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比如顾念和律所合伙人丰盛（黄晓明饰），作为顾念的大学好友，在她的前期成长中给予过多支持，弱化了女性角色本身的个性和人物弧光。“醉酒案”是丰盛提醒顾念调查赵永霖和被害人的关系，“顾念丈夫宋嘉辰的‘贪污腐败案’”为叙事主线，《玫瑰之战》层层揭开双警重工业总经理杜康贪污腐败的真相，天伦乾坤律所合伙人徐慕岩收受贿赂，律所财务总监监篡改造假合同，



▲“高开低走”的《玫瑰之战》，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话题。图为该剧剧照

不开丰盛的外在力量，我们否认顾念的个人魅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职场女性蜕变的内在力量，值得反思。

案件设计需实现“真实性”与“叙事性”的统一

以每个案件1-2集的篇幅，《玫瑰之战》通过“贪污腐败案”“醉酒案”“顾念强奸案”“高天宇性侵害案”“高歌直播案”“过火杀人案”“保险理赔案”“高考顶替案”“抚养权案”“汪小祥餐厅品牌案”等案件的铺展，触及当代社会的贪腐、直播误导、品牌侵权等现象，其直面社会的“真实性”，提升着受众的关注度。以顾念丈夫宋嘉辰的“贪污腐败案”为叙事主线，《玫瑰之战》层层揭开双警重工业总经理杜康贪污腐败的真相，天伦乾坤律所合伙人徐慕岩收受贿赂，律所财务总监监篡改造假合同，

协助周永杰和证人曹培利互相串供，他们的行为损害着社会的法治根基。同时，该剧还有意识地呈现“腐败”的新特征。诸如唐家坤伪造证据的“高考顶替案”聚焦“教育腐败”，何子枫以导师之名骚扰白巧巧的“网红学术达人狼袭案”讽刺“学术腐败”，谷明非在“避税天堂”开公司的“孙薇薇婚前协议案”影射“跨境腐败”等，其所指向的法治问题和人性危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问题，具有真实的普适性。

《玫瑰之战》也以诉讼案件为基础，引出其他有价值、有社会意义的话题。“醉酒案”中全取太太郑瑾为了家庭替赵永霖顶罪，以此反思全取太太的身份和价值。“遗产纠纷案”中保姆伍思思全心照顾韩冬青并传承紫砂制作工艺，反观韩冬青儿孙满堂则未尽心赡养老人，从而反映老年人的赡养问题。“高歌案”中网络主播高歌为了增加人气颠倒黑白，导致丢失孩子的左晶晶不堪网络暴力选择轻生，让观众思考网络直播乱象问

题。“悦悦减肥产品致死案”中的减肥产品以煽动性极高的广告诱导消费者，致使杨婉妮过量使用减肥茶意外死亡，违反《广告法》。这些案件不仅进行法律知识科普，而且涉及社会现象，案件的内在价值不言而喻，其在叙事却差强人意。

《玫瑰之战》的叙事性问题，多集中在案件设计的严谨性、逻辑性以及节奏感等方面。一方面，关于方旭推动关键情节转折的设置。在贯穿全剧的“贪污腐败案”中，方旭意外偷听到徐慕岩和吴蕊的勾结，帮宋嘉辰洗脱嫌疑；在层层铺垫的“高考顶替案”中，方旭意外联系到被盗身份的叶勤勤，揭开唐小樱的秘密；在反转不断的“抚养权案”中，方旭意外看到丰盛和顾念的办公室恋情，让顾念的抚养权之争陷入危机。全剧重点案件过多依赖次要人物的“意外发现”完成转折或突破，方旭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核心功能，刻意的“意外”削弱叙事的内在动力，降低案件本身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关于具体案件的支线稍显多余。比如伍思思和吕明华的“遗产纠纷案”，对韩冬青前妻之子的“抚养权案”，何子枫以导师之名骚扰白巧巧的“网红学术达人狼袭案”讽刺“学术腐败”，谷明非在“避税天堂”开公司的“孙薇薇婚前协议案”影射“跨境腐败”等，其所指向的法治问题和人性危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问题，具有真实的普适性。

线索设计需寻求“感情线”与“律政线”的融合

在中国律政剧的创作实践中，涌现过《人民的名义》《人民检察官》《阳光下的法庭》《决胜法庭》等佳作，在“法”与“情”的表达以及真实案件的叙事策略上颇有特色。但其中也有《离婚律师》《精英律师》《女士的法则》等电视剧往往以“高大上”的“精英氛围”，悬浮生硬的“感情线”，消解“硬核”的律政叙事。律政剧的“感情线”是一把双刃剑，

正如顾念和丰盛分分合合的感情线。这在宣传前期可以增加剧集“看点”，凭借《中国医生》斩获百花奖影后的袁泉，与凭借《烈火英雄》荣膺百花奖影帝的黄晓明，在《玫瑰之战》中献上“办公室之物”，能获得不小的流量和热搜。剧情需要的“感情线”本无可厚非，但顾念和丰盛的感情线和律政线融合度不高，这也是目前大部分律政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顾念认为“造纸厂索赔案”是“不太好办”的案子，丰盛便陪同前往，但是案子却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创作者着重刻画他们参加当地篝火晚会、载歌载舞、深情相吻的场景，案件调查沦为谈情说爱的背景，打乱律政剧的叙事节奏。因此，感情线和律政线应该相辅相成，不能为了制造话题和关注度，以牺牲律政线的合理性为代价。

相较于顾念和丰盛分分合合的感情线，非主情节，但却与律政线巧妙结合，且颇有谈资之感。剧中围绕令仪出现了摄影师白松松、妇产科医生陈瑞麟、健身教练曲博、厨神周令非等男性爱慕者形象，弹幕中“令桃花”的美称也是实至名归。除了白松松，其他男性对令仪的追求依次围绕“冻卵案”“当事人报复案”“汪小祥餐厅品牌案”展开，令仪因为案件认识这些男性，而他们则在案件中为令仪而倾心，两条叙事线索深度融合。尤其是令仪与曲博的支线，曲博邀约令仪参加俱乐部活动，令仪却重其事地穿着晚礼服到场，曲博等人则是清一色的运动装，令仪仓皇而逃，颇具“黑色幽默”之感。

该剧高开低走的窘境，除了“磨皮滤镜”“改编难度高”等外在因素，更在于其女性成长轨迹、叙事合理性以及“情感线”等内在设计失衡。只有融合“法理”与“情理”、“真实性”与“叙事性”、“感情线”与“律政线”，律政剧才能实现叙事突围。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